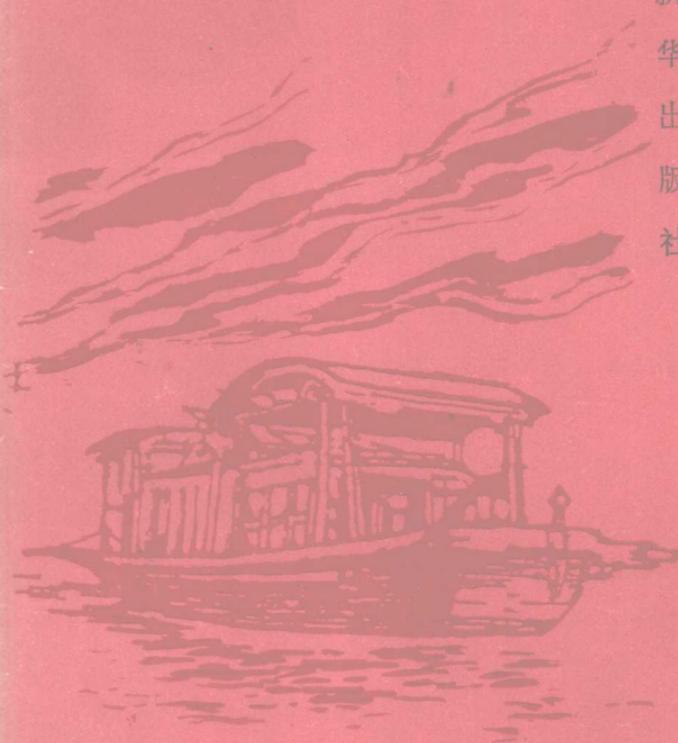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黄峥 编写

新华出版社



##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首道 康克清

主 编：苏双碧

副 主 编：陈君聪

编 委：李 捷 曹宏遂

周道荣 宋镇铃

马宝珠

责任编辑：张传秀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黄 峥 编写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2,000字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5011—0709—2/K·91 定价：0.70元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黄 峥 编写

## 目 录

一、 “南陈北李”筹备建党	1
二、 共产国际的帮助	5
三、 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	8
四、 海外留学生中的建党活动	14
五、 各路代表汇集上海	16
六、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
七、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决议	29
八、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35

1921年的7月，中国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有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正确领导和团结战斗的坚强核心，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了中国，并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使中国涌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她的成立，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

## 一、“南陈北李”筹备建党

1920年2月的一天，在北京城东通往河北省乐亭县的土公路上，晃晃悠悠地行进着一辆骡车。车上坐着两个商人打扮的人。坐在里面的那位，高额头，白面皮，身边守着几本账簿。外面的那位，平顶短发，八字胡，戴一副金丝眼镜。两人一面急急驱车东行，一面小声交谈。

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人一路商量的事情，日后成为中国大地上惊天动地的壮举，并且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也因此成为名垂青史的伟人。

原来，这两个人，一个是李大钊，一个是陈独秀。他们讨论的问题，就是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和陈独秀是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散

发革命传单受到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为免遭逮捕，他决定离开北京，从天津乘船去上海。1920年2月，李大钊亲自陪送他从北京潜往天津。他们扮作商人，坐着骡车，先来到李大钊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在那里住了几天，然后悄悄地到了天津。

一路上，两人详细地讨论了国际国内的形势，畅谈改造中国社会的种种方案，一致认为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一个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他们在分手时约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送走陈独秀之后，李大钊回到北京，立即着手进行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准备工作。1920年3月，李大钊联络邓中夏、高君宇，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聚集了一批进步青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这些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和革命热情非常之高。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天一早就来到北京大学三院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分头去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晚上又集中在一起，议论中国革命的种种问题。这个研究会，为后来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到了这年10月，李大钊在同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联系协商之后，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第一批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11月，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等人，还从青年团骨干中吸收了邓中夏、高君宇、何孟

雄、缪伯英等人，力量逐渐壮大起来。11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推举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北京党的工作由此开始走上轨道，组织也逐渐扩大。到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成员发展到13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陈为人。

在组织发展的同时，共产党北京支部还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革命活动。他们通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用办报纸、出书籍、组织讲演等多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党员深入到工人中间，组织工人开展革命斗争。他们还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进一步把革命青年组织起来。与此同时，李大钊还亲自指导和帮助天津、济南等地建立革命组织。

在李大钊于北京建党的同时，陈独秀在上海也展开了建党筹备活动。

陈独秀到上海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帮助下，以《新青年》杂志社为中心，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1920年6月，其中的一些骨干开始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八月间便正式成立了起来。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赵世炎、李达、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

杨明斋等，以后又增加了李启汉、刘伯垂等人。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

同共产党北京支部一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也开展了各种活动。他们利用《新青年》等作为阵地，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工人中广泛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发动工人开展革命斗争。

为了培养干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6号举办了“外国语学社”，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两个组织吸引了一大批从全国各地来的有志青年。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傅大庆、周兆秋、梁百达、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柯庆施、廖平化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共产党的重要干部。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承担了指导各地建党的重任。他们又秘密创办并出版了《共产党》月刊，作为党内机关刊物。这个刊物第一次在中国鲜明地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大力宣传有关共产党的各种知识、主张，起到了从思想上、组织上指导全国各地建党的作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成员还先后分赴广州、武汉以至日本、法国等地，成为这些地方党组织的发起人。

1920年12月，因陈独秀去广东任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1921年2月又改由李达代理。由于一些成员陆续因各种原因分赴各地，上海党组织的成员到1921年7月时只有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杨明斋等人。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五四运动后共产主义思想信仰者的众望所归的领袖。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担当了在中国筹建共产党的重任。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交换意见。对于所建政党的名称，究竟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两人通信商量后，共同确定叫共产党。他们在发起建党之初，就明确分工，南方由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大钊负责，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历史上有“南陈北李”之称。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 二、共产国际的帮助

1920年4月，在北京的一个小型欢迎会上，李大钊向到会的人高兴地介绍了几位外国朋友，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客人们也作了同样热情的答谢和讲演。这几个外国客人，就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

原来，中国在1919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很快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重视。他们从中看到了东方革命的希望，作出了派人“访问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的决策。1920年3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党员小组维经斯基(Войтинский)等人奉命前来中国。随同他一起来的有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Кузнецова)、秘书马马耶夫(Мамаев)和夫人萨赫雅诺娃(Сахьянова)、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他们在4月一到北京，很快通过北京大学俄

文系教授鲍立维(Полевой), 同李大钊取得了联系。

维经斯基一行的到来, 受到了李大钊等中国革命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李大钊专门为他们举办了欢迎会、演讲会, 并组织北京各方面进步人士同他们座谈。在这些会上, 维经斯基详细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的情况及其内外政策, 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中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更加坚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决心。

李大钊更是为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而高兴。他多次把维经斯基等人请到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自己的办公室里, 共同商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在讨论中他们都认为, 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 应该从速进行这项工作。

为了加快党的建设, 李大钊建议维经斯基南下上海会见陈独秀, 共商建党事宜, 同时自己在北京地区加紧进行各种筹备工作。

维经斯基一行在李大钊的介绍下, 很快前往上海, 会见了陈独秀。

正在上海筹划建党工作的陈独秀, 对维经斯基的到来极为兴奋。两人一见如故, 进行了多次深谈, 反复交换了意见。维经斯基根据苏俄的经验和他在北京、上海见到的情况, 提出应该尽快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加入共产国际, 这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急迫问题, 条件也已经成熟, 建议陈独秀抓紧把党组织建立起来。这一意见和陈独秀不谋而合。

于是, 从1920年5月起, 陈独秀在上海加快了建党的步

伐，很快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坐落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杂志社和陈独秀住处，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点。他们经常在那里开会，讨论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问题。维经斯基也多次参加会议一起讨论。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并征得党的同意，去广州就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维经斯基也同时离上海去广州。他们在广州继续保持着联系。

1921年1月，维经斯基又从广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再次会晤了李大钊，并和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成员进行了座谈。

维经斯基在北京同李大钊等讨论了广泛的问题，其中包括共产党人的信念、组织原则、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共产国际成立、俄国革命经过情况等。对当时正在北京、上海等地掀起的工人运动，作了尤为详细的探讨。

1921年春，维经斯基由北京返回苏联。他在行前向共产党北京支部表示，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共产党组织能尽快联合起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创建中国共产党始终极为关注。在1920年3月派维经斯基来华之后，1920年8月又正式委任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Maring）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来华帮助工作。

马林于1921年3月从莫斯科动身，转道欧洲来中国。

1921年6月3日，意大利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海轮阿

切拉号，从遥远的欧洲飘洋过海抵达上海。一名自称叫安德雷森的荷兰人，随同一群外国旅客下了阿切拉号，雇车到南京路东方大旅社住了下来。十天之后，他从东方大旅社搬出来，住到了麦根路32号的一家公寓里。此人便是马林。他是荷兰人，原名叫亨克·斯尼夫列特。

在此期间，设在苏联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克尔斯基（Никольский）接替已经离华的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也于1921年6月到达上海。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后，很快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接上了头，建立了工作联系，并开始具体帮助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使建党筹备工作大大加快了。

### 三、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

除上海、北京外，全国各地也陆续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组织。其中以湖南、湖北、广东、山东四省的工作最有代表性。

湖南的建党工作，是以毛泽东、何叔衡为中心，在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进步团体的活动中开展起来的。

毛泽东早就同李大钊、陈独秀有交往。1919年冬，毛泽东在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关于苏

俄情况的书，并再次同李大钊、邓中夏等马克思主义者会晤交谈。4月，他从北京到上海，住了三四个月。这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积极酝酿建党，毛泽东同他多次会见，建立了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系。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以后，立即着手筹建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他首先发起创办文化书社，8月2日在长沙楚怡小学召开了发起会议。经过短短一个月的筹备，文化书社于9月9日在长沙潮宗街正式开业，由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

文化书社成立以后，立即成为湖南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的主要活动场所。筹建党团的活动也大都在这里进行。它不仅是湖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而且还是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因此，文化书社对湖南的建党工作有着特殊的作用。

8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又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于9月16日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干事。这个研究会除介绍苏俄情况外，还推荐任弼时、肖劲光等革命青年人“上海外国语学社”进修俄文，准备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

早在1918年成立起来的湖南进步团体新民学会，这时也在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影响和带领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蔡和森、李维汉、蔡畅、向警予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先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很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1年1月，新民学会约集在长沙的会员，到文化书社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聚会。会议在毛泽东、何叔衡主持下，直

接讨论了建党建团问题。许多成员希望成立共产主义组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有的成为党的领导骨干。

根据北京、上海的经验，毛泽东还积极在长沙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1年春，已经从新民学会会员和青年工人、学生中，发展了40多名团员，还在团组织中设立了学生运动委员会、劳工运动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

湖南的建党活动，从当地社会政治状况的实际出发，注重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奠定坚实基础。毛泽东、何叔衡作为发起人，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为日后正式建党创造了许多地区所没有具备的充分条件。因此，在1921年8月以后，湖南党的发展十分顺利，10月就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毛泽东任书记。

湖北的建党工作是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和推动下发展起来的。

当时上海小组的李汉俊委托与他相熟的董必武筹建湖北共产党组织。董必武很快找陈潭秋、张国恩等进行了酝酿。不久，陈独秀又特地派刘伯垂去武汉，要他联系当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筹建共产党组织。刘伯垂到武汉后，按照陈独秀的要求，分别找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等人秘密联系，商讨建党问题。

经过反复协商，大家对在武汉建立党组织取得了共识。1920年秋，由刘伯垂召集，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住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会上，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情况。经过讨论，会议决定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并对小组建立后怎样开展活动作了研究。经刘伯垂提议，会议推选包惠僧担任书记。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经常采用召开读书讨论会等方式，积极组织成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党的工作。为了扩大宣传和发展力量，先后在武汉地区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妇女读书会、利群书社等革命进步团体，并且努力在工人中开展宣传活动。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代表马马耶夫曾两次到武汉，同武汉党组织的成员联系。包惠僧等向他介绍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经过和人员情况，并就社会革命等问题同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1921年春，包惠僧离开武汉去上海，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改由陈潭秋负责。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赵子俊、刘子通、黄负生等。

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是王烬美、邓恩铭。他们的筹建工作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的指导。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由北京去上海，中途在济南作了停留。他们在济南同王烬美、邓恩铭等见了面，并谈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1920年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写信给山东的开明人士、省议员王乐平，同他商讨在济南建立共产主义小

组的问题。同王乐平相熟的王烬美、邓恩铭得知后，便开始了筹建山东党组织的工作。

1920年秋，王烬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紧接着又组织了另一个学术团体励新学会，研究和传播革命思潮。他们在组织和领导这两个团体开展活动期间，主动同北京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联系。王烬美时常去北京，向李大钊等请教如何在山东进行革命活动和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邓恩铭还代表山东的学生界到北京、天津参观学习，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有了来往。

到1920年冬，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励新学会周围逐渐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形成了以王烬美、邓恩铭为核心的骨干。正在这时，李大钊也从北京派人到济南，帮助他们建立党组织。于是，王烬美、邓恩铭从积极分子中考察了一些信仰坚定的骨干成员，秘密建立了济南的共产主义小组。

党组织建立后，他们又通过创办刊物、组织工人俱乐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稳步地开展工作，同时也使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

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广州是当时新思想新文化传播比较快的地区，工人运动的开展也很红火。所以在五四运动前后，广东的革命气氛很浓，曾经掀起过声势不小的反帝反军阀斗争风暴。这里各种思潮都很活跃，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在广东有相当的势力。

1920年秋，广州就出现了一个共产党组织。但这实在是个历史的误会，因为里面的成员几乎全是无政府主义者。他

们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来《广东共产党的报告》说这个组织“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这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立，正准备大力向全国各地扩展。正巧，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的广东省长陈炯明，于1920年11月给陈独秀发来聘请书，要他去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同共产国际代表面议此事，并且去信征询李大钊的意见。商量的结果，一致认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应当接受这一聘请，以便去那里开展工作。于是，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同共产国际代表一起前往广州。上海党的工作由李汉俊代理。

陈独秀到广州后，召集那个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开会，结果发现他们根本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等共产党的基本观点，意见针锋相对。根据这一情况，陈独秀说：“大家主义不同，终究是要分的。联合起来，会因活动手段、策略不同，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手，各走各的路”。这样，无政府主义者便退出了共产党。

在这同时，陈独秀物色到了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一批进步青年。经过几次酝酿，重新组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由谭平山任书记。

重新组建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利用办《群报》、《劳动与妇女》等刊物，努力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还利用他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有利条件，开办了“宣传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俄语学校”等讲习班性质的

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干部。同时，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发动工人建立工会方面也很有成绩。

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除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以及来广州开设罗斯塔社（苏联塔斯社前身）分社的两个苏联人外，先后因各种情况到广州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季、沈玄庐、袁振英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包惠僧也参加了广州小组的活动。这样，广州小组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国内最有影响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

#### 四、海外留学生中的建党活动

在国内各地纷纷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同时，旅居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他们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的一部分。

最有代表性的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建立起来的旅欧共产党组织。

从五四运动爆发到1920年，国内一批有志青年掀起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人数最多时达1600余人。其中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李立三、陈延年、陈乔年、徐特立、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傅钟、肖三等。他们利用欧洲的有利条件，发奋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建立共产党组织